



BISMARCK: A LIFE

俾斯麦的一生

尘封信札背后的真相

〔美〕乔纳森·斯坦伯格
王维丹◎译

在地球上所进行的事情，
总是有一种堕落天使的特质：漂亮，却不意味着和平；
概念伟大，也付出极大努力，亦不表示成功；
骄傲，同时也孤独。

——俾斯麦

B
I
S
M
A
R
C
K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俾斯麦的一生 尘封信札背后的真相

(下)

〔美〕乔纳森·斯坦伯格
王维丹◎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第七章

统一德意志

俾斯麦那伟大的胜利让他面临新的形势。他已经成为民族英雄。奥地利4000万泰尔的赔款已经改变了普鲁士政府的财务状况。俾斯麦有了一个全新的德意志构建结构。过去的德国国会已经荡然无存，奥地利从所有的德意志事务中抽身而退，去寻找作为一个“东部”国家的新身份。即使是在尼科尔斯堡签署和平协议以前，官方媒体就宣布将举行选举，选举法的草案将提交给普鲁士议会。除了普鲁士原有的和新近纳入普鲁士辖区的领土(汉诺威、拿骚、黑森—卡塞尔的部分地区与法兰克福)，获得邀请参与选举的地区将包括萨克森—阿登堡(Sachsen-Altenburg)、萨克森—科堡(Sachsen-Coburg)、萨克森—魏玛(Sachsen-Weimar)、施瓦茨格—桑德豪森(Schwarzburg-Sondershausen)与施瓦茨格—鲁道尔斯塔特(Schwarzburg-Rudolstadt)、罗伊斯幼系(格拉)与罗伊斯长系(Reuß younger Line (Gera) Reuss elder Line)、瓦尔德克(Waldeck)、利普—代特莫尔德(Lippe-Detmold)、香堡格—利普(Schaumburg-Lippe)、梅克伦堡—什未林(Mecklenburg-Schwerin)、梅克伦堡—斯特雷利茨(Mecklenburg-

Strelitz)、安哈尔特(Anhalt)、欧登伯格(Oldenburg)、布朗施威格(Braunschweig)、汉堡(Hamburg)、不莱梅(Bremen)与吕贝克(Lübeck)。1849年4月12日的普鲁士法将是新宪法体系的基础。根据该法律规定,每个选区应该有10万选民。疆域扩大后,普鲁士王国的人口普查显示,普鲁士当时境内居民1925.5139万人。普鲁士与波森由此拥有193个代表。新的联邦将不会均衡构建,因为普鲁士就占了4/5的人口与土地。

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必须解决——俾斯麦政府上台以来,近四年里议会都没有批准政府的预算。俾斯麦已经说服国王,在预算僵局问题上,要向自由派的反对力量做出安抚调和的姿态。即使还未就尼科尔斯堡协议的文本达成一致之时,俾斯麦也采取行动,再次推动让州议会举行会议。这次他让自己的妻子充当代理人。7月18日,俾斯麦写信给妻子,告诉她尼科尔斯堡的谈判已经开始,然后问她“为什么我们不召开议会呢?问问奥伊伦堡这个问题,告诉他关键在于,真正商讨和平谈判以前要允许议会的各个集团可以干预”。俾斯麦假借民族之名,有意利用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的力量增强自己对谈判的操纵力。但他也让自己的内阁同僚知道,一旦国王返回柏林,就会召开州议会会议讨论解决突出的预算争议问题。国王已经同意——出于对“冲突内阁部长”的恐惧——要求对无宪法管理的过去做出补偿。

即便在国王回到柏林以前,普鲁士政界的战线也已经开始转移。7月28日,一个新的保守党横空出世,它自称自由保守联盟,致力于支持俾斯麦。同日,特莱齐克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说:“代表我们的革命来自上层。”许多自由派现在承认他们的方法失误。哥根廷大学法律教授、财产权专家鲁道夫·伊赫林(Rudolf Ihering, 1818–1892)此前称俾斯麦发动的战争是一种“可怕的轻率”之举,而今则臣服于“俾斯麦的天才”。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可能协调他们的新地位与自己过去的反对立场。正如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所认为的那样,原因在于俾斯麦此前打败了新专制主义者和奥地利的天主教徒,进而赢得对天主教反革命势力的重大胜利。在许多普鲁士的自由派新教徒看来,俾斯麦的政治成就与一个新教徒国家的胜利必然就是天意,是进步。因为在教皇庇护九世统治下的19世纪60年代这代人看来,任何自由主义的迹象都是遭到谴责的。俾斯麦在战争中与“无神”的意大利王国结盟,而意大利在国内统一的战争中夺取了教宗的辖地,意大利的首相加富尔伯爵致力于让新的意大利王国向“自由国家的自由教会”努力。这些都使

俾斯麦站到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敌对面。因此，当听说奥地利在柯尼格拉茨—萨多瓦吃了败仗的消息时，梵蒂冈枢机主教安托内利(Cardinal Antonelli)愤怒地高呼“Casca il mondo! (这个世界在堕落!)”这看来也是合乎逻辑的。

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欢迎俾斯麦的新妥协政策。国王致下议院演讲稿外泄后，汉斯·冯·克莱斯特在1866年8月1日写下一篇致俾斯麦的长篇备忘录。文中反对补偿的提议，这样写道：

怎样才能让所有老的普鲁士机构及其权力的一切元素都会通过一次英国国王致下议院演讲做出的声明而甘拜下风，而且通过它——财务、军队、上议院、君主制、普鲁士自身——拱手让给根据新法规诞生的第二届议会的暂时多数派？这虚无缥缈得难以想象。短期或者长期来看，今后安然通过一个深不可测的漩涡是毫无希望的。没有缔造普鲁士的精神……没有一个独立的君主制，普鲁士无异于行尸走肉。

俾斯麦那时去了布拉格，在那里与奥地利人进行最后的和平谈判，也在那里得知了演讲内容泄密一事。他态度轻蔑，不理睬自己的老朋友。他于8月3日写给妻子的信中透露：

关于国王致下议院演讲，有个巨大的骗局。保守地来说，利普(Lippe)传播的圣上讲话是反对我的。汉斯·克莱斯特已经激动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这些小人物做得还不够。他们短浅的视野范围还没有超过自己的鼻尖。这些人现在还在辞藻的风暴浪涛中练习游泳。我可以对付自己的敌人，但不会与朋友做对！他们都戴着有色眼镜，是一群井底之蛙。

《十字报》的保守派曾经是俾斯麦的朋友，这时他们怀着恐惧的心情离开了俾斯麦。而他从前的敌人——那些德国自由派却与他关系更近。正如卡尔·弗伦泽尔(Karl Frenzel)在期刊《德意志博物馆》(*Deutsches Museum*)上撰文所写：

过去，这个政府已经让自由派成为敌人。通过战争和准备的合并，政府又将封建主义成为敌人。政府在国内事务方面取得的成功有赖于普鲁士

两个党派势力削弱，以及在成立一个将越来越发展壮大的政府党派。

1866年8月5日，英国白厅宫(White Hall of the Palace，又名怀特霍尔宫)里，议会代表济济一堂，因为国王就要在这里发表对下议院的讲话。讲话中，国王承认：

政府多年来毫无法律基础地动用国家预算……近来的事件带来了信心，我珍惜这种信心。它归功于必要的一定程度上理解，在没有预算法的情况下进行管理这一方面，我的政府愿意给予赔偿。此前的冲突将永远画上句号。

国王演讲期间：

汉斯·冯·克莱斯特避免和俾斯麦打招呼，但却站在白厅宫里。这样一来，俾斯麦就不可能看不到他。两个人都没有离开，一直等到仪式结束，整个大厅人群散尽，空空如也，俾斯麦才走近冯·克莱斯特，问侯道：“嗨，老伙计。你从哪儿弄到国王对下议院演讲的？”回他的却是：

“我不会告诉你的。”俾斯麦又说：“我可不喜欢在这个问题上开玩笑。如果你不说，我就必须让公诉人起诉你了。”这次的回应是：“说对了，你可以把我铐起来，但还是不会搞清楚。”两人不欢而散，连道别都没有说一个字。在国内，因为克莱斯特正在改变，所以首相派自己的总管恩格尔送信，请克莱斯特回到自己这边。他还找到了罗伯特·冯·德戈尔茨和卡尔·弗里德里希·冯·撒韦林。首相恢复了常态，以友好的方式对待刚来的伙伴，边与对方握手边说：“把过去都忘了吧。”身为内阁固定班底的一位部长在州议会上坦陈：“我估计这个人必定是瓦格纳”，接下来俾斯麦向格尔茨与撒韦林解释说，对于“补偿”一说，他已经与王储没有争议。

尽管俾斯麦做出道歉，但他与克莱斯特再也没能恢复往昔的友谊。

俾斯麦现在陷入一种不寻常的处境之中，为了完成他那新德意志帝国的计划，他需要自由派。从1866年起，自由派成为他的盟友，直至19世纪70年代他无礼地抛弃了这些盟友为止。1866年，俾斯麦迅速赢得人们对他个人的“膜拜”地

位，但他的自由保守党却从未真正追随他。这以后，围绕俾斯麦的这种矛盾事实使新的政治格局产生了一种比以往更古怪的特色。俾斯麦的新德意志有三大党派：自由派(分为支持与反对俾斯麦两股势力)，保守派(越来越反对俾斯麦)和天主教派(反俾斯麦)。他不可能依赖这三派作为自己表现的舞台，任何一派都不能成为他的党派。新时期的大幕拉开，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大矛盾。这矛盾就是，19世纪权力最大的人物却没有得到议会真正的支持，还要依靠个人依靠一位年迈国王的情感与态度。民族主义的浪潮席卷德意志，可俾斯麦不算民族主义者。自由派着眼于统一和自由，但俾斯麦不属于自由派。正像汉斯·冯·克莱斯特和路德维希·格拉赫现在了解的，俾斯麦也根本不是保守派。他就像深水池中的水，能吸收光线，产生各种各样的色度，改变自己的颜色。

8月14日，新任财政部长奥古斯特·冯·德·海特、俾斯麦的“黄金叔叔”向众议院的预算委员会递交了补偿法案，阐明补偿和新贷款额度的请求必须放在一起考虑，“因为政府无论怎样都没有感到任何压力，相反，政府的财政状况完全有富余，因此无需有任何做出让步的倾向”。委员会以25票对8票的结果赞成双重法案，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一方面给予政府贷款，一方面又拒绝补偿，这看来不合逻辑”。议会两院通过法案后，国王于1866年9月14日签署立法生效。

能体现这是变革时代的还有一个迹象，它出现在柏林的另一个领域。1866年9月5日，一座摩尔风格的新犹太会堂在柏林中心的奥拉宁堡大街(Oranienburger Strasse)投入使用。它内设3000个座位，是德国最大、最华丽的犹太教会堂。艾米尔·布雷斯拉夫(Emil Breslaur)在犹太教报纸Allgemeine Zeitung des Judenthums上这样报道这次事件：

上午11:30，这座宏伟的建筑向我们敞开怀抱。正门与大厅都装饰着花朵、花环和珍贵的盆栽，布置得很有艺术品位。内殿里有些是犹太社区的人，有些是获邀前来的嘉宾。宾客之中，我们注意到有俾斯麦伯爵、v.d.海特部长、陆军元帅弗兰格尔、警察局长冯·贝尔努特(von Bernuth)，此外还有柏林市的法官和市议会的议员，普鲁士众议院的很多代表，其中包括议长弗肯贝克(Forckenbek)(原文如此!)、科赫牧师(Dr Kosch)、约翰·雅各比(Johann Jacoby)。管风琴师施万策(Schwantzer)作曲的

序曲为开幕式拉开帷幕。在皇家音乐总监莱万多夫斯基(Lewandowski)的指挥下,唱诗班伴随着管风琴和铜管乐吟诵着希伯来语的“多么美好”等颂词,精心装饰的经卷就伴随着歌声乐声送入内殿。

俾斯麦和其他内殿的客人目睹经卷沿着主通道进入视野,在音乐与吟唱声中随着图示放入藏经卷的壁龛。接着,拉比·阿布(Rabbi Aub)布道宣讲了《哈该书》(*Prophet Haggai*)第2章第9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毫无疑问,拉比这段布道词不仅可以用在犹太社区的伟大圣殿内,至少也适用于大部分新一代北德意志联邦的“颂歌”。

冲突时代结束了,俾斯麦希望撤掉“冲突内阁”。波德尔希温格于1866年5月底卸任,但国王不喜欢内阁出现新面孔。因此,俾斯麦只有在1873年换下了赛尔科和伊岑普利茨,1872年送走了穆勒。至于司法部长利普伯爵,他已经成功地在1867年就撤掉了。正如赫尔玛·布伦克指出的:“俾斯麦自视为杜拜尔和柯尼格拉茨真正的胜利者……国务部的学院式结构很快就成为俾斯麦的眼中钉、肉中刺。”和俾斯麦政治生涯中始终面临的形势一样,这次权力也落在别人手中。这些内阁部长不是为首相,而是为国王服务。由于俾斯麦拒绝建立议会制政府,他就剥夺了自己凌驾于内阁的权力。如今,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首相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有这种权力。俾斯麦不能仅仅重新给自己的内阁洗牌。他那种专制的冲动与王室掌握权力的现实相冲突。他已经让那些解职的部长成为自己永远的敌人,然而,他也知道这点。正像他对古斯塔夫·冯·迪斯特(Gustav von Diest)解释的:“我从未低估过波德尔希温格的危险性。你知道他是哪种人吗?他就是条狐狸,你以为你打中了它,要把它当做猎物带回家,它却跃过你的肩头,然后落下去的时候咬了你的屁股。”

1866年9月21日,普鲁士军队在皇宫前胜利阅兵,以一曲庄严神圣的《赞美颂》(*Te Deum*)作为结束伴奏。古斯塔夫·梅维森(Gustav Mevissen, 1815—1899)是那期间首屈一指的天主教工业家与银行家。军队接受检阅时,他就站在人群中,后来他记下了当时自己的感受:

我无法忘掉这个时刻留在脑海的印象。我不是战神的信徒……但是,战争的战利品对爱好和平的孩子像变魔术似地施加了一种魔力:目

光会心甘情愿地聚焦，心驰神往。男子汉们一列又一列经过，仿佛队列没有止境。他们为神圣的时刻——胜利喝彩。

1867年2月，《现代评论》(*Revue moderne*)上刊发了路德维希·巴姆贝格的一篇文章，题为“俾斯麦伯爵”(Monsieur de Bismarck)。这篇散文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867年6月，它以图书出版的形式重印问世。巴姆贝格曾是一位犹太革命者，后来摇身变为成功的银行家，成为俾斯麦最亲密的顾问之一。他无疑是第一个发现俾斯麦有多激进的人：

目前，德意志从未爆发针对自身的革命。这是拥有光荣历史的民族。新教和哲学概念的自由就在这里诞生。可是，就政治解放而言，它还从未有自发的和持久的创新建树。在这方面，它无法与英国、美国、法国、瑞士、荷兰和比利时相提并论。在这些国家之中，它的革命最后一个到来。1866年，德意志第一次没有因为国外的激励而自身经历的一场有机大变革……这是谁也不能怀疑，俾斯麦就是天生的革命家。革命者是生就的——就像世袭王位正统派那样——他们大脑的某些构造生来就不同。而机遇决定了一个人是变为革命派还是反革命派。

到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大众媒体开始生根发芽，开枝散叶。这也为俾斯麦打造了我们将会称之为媒体个性的特质。1853年成立的周刊Gartenlaube(花园藤架)是一本新的中产阶级流行杂志。从1867年开始，这家杂志推出了一个专栏，名为“来自德国国会大厦的相片”。4月那期的专栏带来一幅可敬的俾斯麦个人相：

在给联邦议员们准备的高凳上坐着一个人。不仅是普鲁士与德意志，整个欧洲的目光都落在这个人身上，都对他有着浓厚兴趣。就像《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第一位国王扫罗，他比同代人都高出一筹。他是个令人难忘的贵族，身着气派的骑兵军装。他集军人的充沛精力与政治家的灵活弹性于一身。

俾斯麦的全身与半身像售价数千。他成为时代的标志人物。

1867年6月7日，国王从皇家基金中奖给俾斯麦一笔“捐款”。俾斯麦用这笔资金在波美拉尼亚买了一座庄园，那里容纳了瓦尔津一个镇。买下庄园后，俾斯麦提出将克尼珀霍夫卖给自己的兄长或者外甥菲利普，“但不能比我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的价格更低”。这是典型的俾斯麦式的吝啬做法。作为一位开国元勋，名垂青史的人物，奥托·冯·俾斯麦终其一生都保留着贫穷乡绅斤斤计较的习气。另一方面，如同我们已经见到的，他也保留着自然而然的敌意，这种敌意不受任何影响。他年轻时就了解这点。波美拉尼亚的庄园到手，俾斯麦催促朋友莫特利登门，到自己新的庄园来看看。1869年，他对莫特利解释说，虽然新庄园远离柏林，但铁路改变了一切：“早上9点你从柏林出发，到这里的时候能赶上吃晚饭。”莫特利最终拜访了瓦尔津，他在给妻子玛丽的信中描述了俾斯麦在那里的生活：

瓦尔津的生活方式很简单，但大家的作息时间差别很大。我经常9点多、不到10点下楼，莉莉也是(莫特利的女儿)。我们偶尔会碰到俾斯麦的夫人、玛丽和俾斯麦的几个儿子，然后就一起吃早餐。俾斯麦约莫11点起来。他的早饭很清淡——只有鸡蛋和一杯咖啡——早饭后用海泡石烟斗抽支烟。他坐着和我们所有人闲谈，这时他的秘书递给他一叠信。他卸甲归田的日子就靠这些信来激励了。秘书还给他一支大约1英尺长的铅笔。他用这支笔写下备忘录，做出回复和其他部署。同时，男孩们在同一间屋子的另一边打桌球。那里还有一条名叫“撒旦”的大黑狗，它经常横冲直撞地穿过公寓，每个人交谈它都要插一脚……在院子那边的主建筑有两层楼高，从房子左右两侧伸出长长的两翼，这两部分设置了仆人的房间和办公室，构成了一个开阔四方形建筑物的三面。在草坪或者树林那边有一段长廊。它位于主建筑前方。房子内部是一个正方形的大厅，一段宽阔的阶梯通向大厅上方的一个大厅，走过大厅有四个宽敞的房间。下方大厅的每一面都有一间或者两间房间。除了用作他的图书馆和女士们的私房，它们之中还有家庭和会客用的房间。这座庄园面积约3万摩根，相当于2万英亩(译注：摩根为丈量土地面积的单位)。这其中有一大部分——可以确定有 $\frac{2}{3}$ ——森林、松树、橡树、长椅。其余还有个小农场，约200到300

英亩。这是他亲手打理的。剩下的是些800到900英亩的大农场。维珀河(Wipper)流经这片土地，是很有价值的水力来源。俾斯麦在河上建了两三个水力磨坊，其中一座磨坊已经开始运转。

瓦尔津成为俾斯麦心灵体系的核心。他需要林地，在那里可以安静地散步很久，需要有一种身处自己的土地上的感觉。他回归了容克乡绅的身份，他就是背着这种身份标签长大的。这是他的撤退。

在1867年的大多部时间，俾斯麦不能离开柏林，这只是因为有太多事要做。他必须建立两个政府：一要重新部署普鲁士的国务部，二要成立北方德意志联邦的新联邦政府。俾斯麦打算双管齐下，但不能很快找到同时进行的方式。假如普鲁士主导的新联盟很大程度上再创造了德国国会，又没有奥地利参与，它可能要承担法兰克福的那些机构。它会拥有一个大师委员会作为管理机构，新联盟还要设一个秘书或者总理执行联盟的集体决策。联盟总理可能是位公务员。这个人会接受普鲁士首相、也就是俾斯麦的命令。普鲁士既拥有自身代表的投票，又得到了那些普鲁士吞并的德意志邦国投票。这会让普鲁士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能造成障碍的否决权，而那些很小的国家从来都不敢反对普鲁士。如果一位政治家此前能够吞并历史悠久的汉诺威王国，那么今后他就能用施瓦茨堡-桑德豪森做早餐。另一方面，正如俾斯麦国内的自由派新朋友们所望，新的联盟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有自己的国家内阁、自己的法律、度量衡和国内政治圈子。打造一个混合形式的德意志联邦结构并非易事，也无法确定，这些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会造成困难。但俾斯麦现在贪得无厌，野心勃勃，这使那些困难几乎无法得到解决。

北方德意志联邦必须开始清理整顿，此外，还要与曾经同奥地利兵戎相见的德意志南方国家建立正式关系。这个联盟此时面对的普鲁士刚刚得胜，疆域扩大，比以前带来的威胁大得多。1866年8月，普鲁士分别于13、17和22日敲定了和平条约以及与符腾堡、巴登和巴伐利亚结盟的平等条约。9月23日，汉诺威并入普鲁士，成为普鲁士的一个省。

目睹这些条约签署，出现如此转变，奥古斯塔王后内心的焦虑越来越重。她是魏玛公国的公主，属于萨克森王室的“欧内斯廷”(Ernestine)支脉。她喜欢说萨克

森方言，从来没有完全按普鲁士的方式生活。她是巴登大公的母亲，对中等邦国的遭遇感到同情。对于南德意志地区，4个仍然独立的国家，冯·罗根巴赫男爵写过长篇报告，汇报那些国家发生的政治转型。奥古斯塔王后在这些报告的空白处都做了评论批示。她还草拟了一些信件段落，打算写信给自己的丈夫威廉国王。10月11日，她在写给威廉的信中附上了罗根巴赫的备忘录。信中这么说道：

我怀着最真诚的心请求您：尽一切可能握住巴登向您伸来的友谊之手。若我并未传达给您以上描述的严峻形势，而且并未以上帝之名促请您在合适的时机出手保护那些亲近我们的人，因为这样做有利于这个美丽的国家，那么我就是在无视自己母仪天下的责任。

1866年秋，王后与罗根巴赫继续互相通信，信的篇幅都很长。为安全起见，两人找了可靠的人代为送信。对于主权国家的问题、普鲁士与新联盟间的关系和新联盟内部与外部的现有国家，他们都有考虑。王后有活力、有韧性、做事条理清晰，这些会让她成为俾斯麦的一大劲敌，可她不是非与他成为敌人不可的。假如俾斯麦像罗根巴赫那样重视她，他本可以赢得王后的支持。信件中没有任何内容暗示1866年她拒绝过国王和俾斯麦的政策。她在相互交流中主要担心，一些不完善的主权国家发展为一个不同层次的复杂演化结构。这种担心是完全合理的。在1867年1月初的一封信里，她遗憾地写道：

我遇到他的时候，既然我与领导者和相关事务主管没有个人接触，这些情况我是不负责任的，我可以说，与他的观点没有任何关系，是否与此同时他的观点更精进了都是如此……不幸的是，我也不能给你发一份联盟宪法的复印件，因为我自己都没有能力得到复印件。

如果俾斯麦的疑心和对女性的厌恶之情少点，他原可以发现这位女性有多么出色。即使不是做盟友，至少她也可以成为一位愿意倾听的听众。可是，如果要认真听一位女性说话，俾斯麦不可能控制局面，或者说会忽略对方。他那套向对手略施侮辱手段的古怪政策——新宪法的复印件没有发送给王后——揭示出，他对待敌人那种心胸狭窄的又持续不绝的报复心。

与此同时，病痛已经把俾斯麦击倒。近几个月连续的压力已经侵蚀了他的健康。这开始形成一种此后多年里越来越常见的犯病模式。俾斯麦频频患病，因此离开柏林的时间越来越久。据弗兰兹计算，从1875年5月14日到1878年11月一共1275天时间里，俾斯麦有772天，也就是60%的时间不是在自己的庄园，就是在温泉浴。俾斯麦的病情让一些资深外交官担忧。冯·施瓦尼策将军竭力要弄明白俾斯麦到底怎么了。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有如下记录内容：

冯·德戈尔茨伯爵已经到了，他在瓦尔津。我问俾斯麦是不是真的病了。他大笑起来，那种笑很特别，只有他才会有，巴黎人称之为“开心得让人恐惧”。他回答我：“什么？那个人病了？俾斯麦从来都没病，我病了。”格尔茨告诉我不少，但还不够多。

1866年，俾斯麦为恢复健康离开城市，去了波罗的海的普布斯(Putbus)。传说俾斯麦和他的忠实的助理、曾经是社会主义者的罗泰·布赫尔在两天内草拟了宪法。而弗兰兹透露，俾斯麦实际上此前就亲自拟定了大部分宪法内容，也得到了帮助，但这是一部“他”的宪法。为了适合他自己的需要，为了保持他的权力仰仗的特有专制架构不变，他才设定了这部宪法。

和德意志帝国此后的宪法一样，这部宪法的基础是缔造它的王公贵族们结下契约。人民没有在其中发挥任何作用。人民这个词只出现在与代表“人民”的德国国会有关时。规定联盟议会与联盟主席团(Federal Presidium)的章节在这部宪法中最有特色。第6章阐述，联邦上议院或称联盟议会包括过去法兰克福的联邦上议院成员，“前德意志国会全体会议的法规规定了那些人拥有投票权。这样一来，此前汉诺威、拿骚选侯国和法兰克福的选票都由普鲁士所有，总计17票”。根据第7条规定，“多数票”决定决策。既然普鲁士拥有全部43票中的17票，任何一个小国家附和普鲁士就可以阻止推出一项措施。联盟的领导(第11条规定)是“属于普鲁士国王的主席团”。主席团(第12条规定)可以召集、中止或解散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员。第15条称，联盟委员会主席和事务的指导者都属于联盟首相，首相由主席团任命。这是俾斯麦为自己设计的职位，因为它直接取决于代表主席团的普鲁士国王，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决定。联盟没有内阁和其他正式存在的官员。还有一

条很重要，那就是第20条。它规定，德国国会的成员由大选产生，直接选举采用不公开的无记名投票。俾斯麦在1866年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坚持未变。

北方德意志联邦有一个民主的下议院，可以与当时全世界最民主的议会媲美。但这种民主的权力是有限的。军队的权力掌握在占总人口比例1%的少数人手中(根据第60条)，第62条确定每位士兵总费用225泰尔。而德国国会无权决定军费开支。俾斯麦从一开始就消除了任何这方面的新冲突。从内容来看，预计有人可以挑出俾斯麦这整个草案的缺陷在于：没有人权法案，没有独立的司法权，没有直接征税的权力，没有豁免权，非内阁成员的代表也没有权力。这部堪称庞然大物的法律——复杂又难以控制——基于一个支点——普鲁士国王、德国国会主席团和一位普通官员的普遍独立主权：普鲁士首相和联盟首相。换句话说，俾斯麦是为自己设计了这部法律。北方德意志联邦的宪法大致上每字每句都与新德意志帝国1871年的帝国宪法相同。它只是在1871年以后将那部如出一辙的普鲁士法律转移到了统一的德意志，后者的所有缺陷也都随之转移。第63条赋予普鲁士国王指挥全体军队的权力，而且国王的指挥仍然不受任何限制。因此，按照新的部署，朝廷的随从、军事与海军顾问团和国王的秘密顾问团和以前一样仍然存在。假如联盟主席团想让首相解职，他是有这个能力的。俾斯麦建立这个脆弱的组织架构不仅是为了适合他自己的特点，也是为了配合强势的首相凌驾于弱势的国王这种安排。他在1890年发现，保证也不能保护自己免受一种不同的独立主权影响。

1866年12月1日，俾斯麦回到柏林，然后对宪法草案做了最后一次修正，于12月9日呈交国王、王储和普鲁士部长，当月15日递交德意志邦国的部长代表委员会。事实证明，与各国王侯进行的谈判令人不快，但俾斯麦一如往常，已经有自己的替代选择。新的德国国会将于1867年2月12日举行选举。如果萨克森国王或者梅克伦堡—什未林大公制造麻烦，俾斯麦就必须转向可能当选的民主势力。他向普鲁士官员秘密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在国会不要和以往那样帮助保守派，而是帮助激进派，目的是为了“向拒不服从的那些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

票选结果对俾斯麦来说非常之好。国会成员297人，其中保守派赢得63个席位，德意志帝国党(亲俾斯麦派)占40个代表席，民族自由派80席，其他自由派40席，进步党仅19席。在柏林的一个选区，犹太激进派爱德华·拉斯克(Eduard Lasker)

以4718票对1765票的投票结果展示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几乎一半的代表都是贵族，其中有一位王室亲王，4名非王室亲王，2名公爵，27名伯爵，还有21人是男爵。从那时起，俾斯麦就会操纵独立的德意志公国王侯，让他们反对人民。正像他在写给萨克森政府的信中所说：“总是存在这样选择：要么永远彻底地依靠这些现在暂时与我们结盟的政府，要么就面对必须力求我们在议会里占据核心地位的需要。”针对宪法的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持续了两个月，直至4月16日。在宪法做出各种小修正以后，国会终于以230票支持、53票反对通过了宪法。1867年5月31日，普鲁士州议会也批准了该法律。俾斯麦又赢了：这部宪法里没有人权法，没有独立的司法权，没有负责的内阁，代表们也没有酬劳。这次胜利没有柯尼格拉茨的那场胜仗那么令人欢庆兴奋，但它对俾斯麦意义重大。俾斯麦已经将数百万德国人统一到一个新的国家里。他们选出的代表牺牲了自由权。而如果在其他地方，代表们会认为，如果没有经过一场像样的战斗，是不会放弃这种权力的。新的德意志仍然保留着普鲁士那种半专制主义最差的特性，而这些特性尽在奥托·冯·俾斯麦掌握。

俾斯麦1867年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它使俾斯麦的日常生活变得复杂，而且至今仍在折磨那些不得不理清俾斯麦活动历程的传记作者，他们的运气实在不怎么样。经过刻意设计，在这个2957.2511万人口的新国家，俾斯麦成为唯一的管理机构。他需要将数千事项立法，行政改革，做出改变。铁路、邮政系统、法律结构和准则、道路和运河、银行与币制、工厂检验、学校、金融系统、大学和技术学院都必须彼此相互适应。他没有制定联盟内阁的条款，对于首相要如何工作也没有很清晰的想法，因为他已经决定要将首相的职务与普鲁士国务部的支配权合并。从1867年到1890年失势，俾斯麦不可能控制与指挥在他的名义下发生的所有事，他的生活成为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史拓诗向自己的妻子解释过，普法战争后，俾斯麦怎样在与法国谈判停战期间自己做了所有的决定。史拓诗还说，只要是在俾斯麦手下工作过的人，他们的日记里都会多次出现这种典型的俾斯麦式行为：

我有机会看到过俾斯麦的行动(在和平谈判中)，必须承认，我钦佩他的观点和行动的活力。非常奇怪的是，从另一方面看，在关键的谈判中，除了那些像我这样他需要咨询技术性问题的人，他是多么急于让所

有人靠边站。他独自坐在对手的对面，对自己毫不留情。这样做的优势是谈判会很快结束，劣势是协议仍然有各种不同解读。那么就必须靠强权确认是哪些解读。

欧洲发展最快的现代化国家不能由一个天才型的政治家说了算，可俾斯麦拒绝让其他任何一个人尝试管理。

此外，他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联邦上议院、或者联盟委员会的功能与属性。这个委员会是做什么的？它是上议院，某种形式上是他这个新国家的上议院吗？或者，它只是给德意志小邦国用来聊天的地方？1867年7月21日，俾斯麦给自己在外交部的代表赫尔曼·冯·泰尔(Hermann von Thile)写了一封信。信中展示出，普鲁士与德国国会哪一方优先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我认为，国王正式召开联邦上议院的首次会议上既没有必要，也不会令人满意。这会使我们的在联盟内的同僚们产生一种印象，即他们的国家代表和普鲁士议会的代表是一类人。实际上，只有联盟预算和关税协议应该只需要提交联邦上议院，因为大家知道，后两者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它们无需最高统治者做出决定。

总之，联邦上议院绝不能得出超越其地位的观点，也绝不能干预俾斯麦的政策。

但内阁的负担仍是问题。1867年8月10日，俾斯麦向联邦参议员提议，成立联盟首相办公室，称“这个机构是将不同的管理分支机构集合在一起，找到他们的集中点……(顾问团是)为一些部门合作做准备，这些部门的职权涉及到提交联邦上议院、作为领导的普鲁士国会和北方德意志联邦的事务”。最后，俾斯麦成立的这个首相办公室有自己的工作人员。他选择鲁道夫·德尔布吕克(Rudolf Delbrück, 1817–1903)任联盟首相办公室的领导人。对俾斯麦来说，德尔布吕克是适合的人选，因为他从未担任过部长，因此从未听命于议会。他在贸易部做过高级公务员，也是关税联盟事务的专家。在俾斯麦提拔他以前，他以下的这番话表达了他个人的期望：

凭我与国王和俾斯麦伯爵的关系，我可以估计到，几年后我可能成为贸易部长伊岑普利茨伯爵的继任者。我会以普鲁士贸易部长的身份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可这些都变得完全不同了。

1867年8月12日，新的德国国会批准组建副首相办公室。这是为俾斯麦设的。副首相主持新的“首相办公室”（Bundeskanzleramt），在首相缺席联邦上议院会议时是代表首相行使领导权的官员。时间越久，首相缺席的情况就越来越常见。新的副首相职位一旦确定，就会像一台管理发电机那样开始管控新国家的方方面面。新的办公室不间断地发布政令——俾斯麦称之为“命令腹泻”。德尔布吕克以一种其他人从未有的方式了解到，依照俾斯麦的意愿，要怎样将绝对官僚主义的效率与彻底的监控相结合。俾斯麦1870年对巴登大公说过：

我可以这样说，德尔布吕克这个人各方面都能彻底主导他的办公室。而且，他有一种超常的能力，能够管理事务并且付诸执行。

德尔布吕克很快成为“副俾斯麦”，但他实际上完全不像俾斯麦。这种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俾斯麦能做这么久的独裁者。德尔布吕克干工作不需要外界认可他个人，也拒绝给他头衔，在个性专横的俾斯麦手下工作很顺利。1867年到1870年，德尔布吕克立法推出了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度量系统、自由进行贸易和交易工艺品的统一系统、自由转移和结算。俾斯麦的老朋友、同时也是老对手卡尔·弗里德里希·冯·撒韦林说：“德尔布吕克担任这个职位的实力在于，他只对俾斯麦觉得无聊的事感兴趣。”

“副俾斯麦”与其他官员的关系从来不好相处。1873年2月，当时军衔还是将军的史拓诗已经做了新帝国海军的最高领导者。他就与俾斯麦和德尔布吕克发生了冲突。史拓诗在给王储的信中写道：

我运气不好，要确认一项帝国的命令，这本来是帝国首相的工作。另一方面，首相倒是通过自己的代表（德尔布吕克）表现出对我的部门有兴趣。由此导致的冲突酿成了一场暴风雨，它就发生在国务部长在帝国首相